



公共管理译丛

赵成根 主编

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

——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

Democracy,
Bureaucracy
and Public Choice
Economic Explan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英] 帕特里克·敦利威 著

Patrick Dunleavy

张庆东 译

徐湘林 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公共管理译丛

赵成根 主编



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

——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

[英] 帕特里克·敦利威 著

Patrick Dunleavy

张庆东 译

徐湘林 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 / [英] 敦利威著; 张庆东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公共管理译丛)

ISBN 7-5006-5070-1

I. 民... II. ①敦... ②张... III. ①民主 - 理论研究②国家机构 - 理论研究
IV. ①D082②D0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3606 号

Democracy, Bureaucracy and Public Choic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China Youth Press

Copyright © Patrick Dunleavy 1991

This translation of Democracy, Bureaucracy and Public Choice,

First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2 - 292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9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 × 1000 1/16 22 印张 237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32.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总 序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大规模的工业社会逐渐取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动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迁。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发展。民主政治和现代官僚制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也是影响和塑造20世纪的一种基本力量。

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运转过程中,从经济管理、社会服务到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外层空间的竞争,现代国家政府都以某种方式介入,承担了广泛的公共管理职能,政府能力因此成为衡量政府的一个核心指标。提高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的新的时代需求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结构的重塑和理论重心的转移,也推动了以政府管理效率和政府能力为核心衡量指标的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

自从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以来,公共行政学经历了制度视角的研究(1910—1930)、人的视角的研究(1930—1950)、管理过程视角的研究(1950—1960)和环境视角的研究(1960—1970)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970年代末,公共行政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流学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改革影响下,作为公共行政学新的发展阶段的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结构呢?或者说应该怎样实现公共行政学理论结构重塑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美国等公共行政研究极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公共行政研究尚处于恢复重建草创

期的中国,要实现公共管理学的迅速发展,使公共管理理论能够真正反映公共治理的内在规律,并科学地指导着公共治理之道的改革与发展,都必须充分地关注以下各种塑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要素:

第一,以竞争性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是现代西方国家制度的主体构成部分,在现代西方国家治理中,其他各种政治制度安排都要从属于这一民主政治制度,并受到其内在逻辑的制约。作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其官僚制行政组织的结构体系和运作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主政治逻辑的影响,综观今日西方国家的公共治理,从政府构成环节的政党竞争和选民投票仲裁,到政府预算和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直到区域自治、城市自治、社区自治、公民自治等各种自主管理模式,整个政府系统运作和公共治理的各个环节,无不弥漫着民主的精神。因此,不理解民主政治,就无法理解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不以民主政治学理论为依托,西方的公共行政学就失去了其灵魂。

第二,如果说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百年,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史,政府职能扩展的主要领域则是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已经成为塑造市场秩序、调控市场运行的一种主导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一个核心的研究对象就是政府、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也正因为如此,公共经济学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最新的主流理论流派,已经成为塑造公共管理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三,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公共管理和私人工商企业管理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融通和伙伴合作关系,但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行政改革的后果,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企业管理模式成为影响公共管理直至重塑公共管理模式的一种基本力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影响下,西方的公共管理主体和公共管理模式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第四,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后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商品只有成功地实现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资本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本质属性,就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一个统一的、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秩序,要求不断扩大的原料供应地,不断扩大的产品和服务销售市场。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也正是市场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全球化的动力蕴藏于资本的本质之中,全球化肇始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当大英帝国的商船和炮舰开始驶向世界各地之时,全球化的历程就开始了。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发展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的一种主导因素。

正是由于以上要素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和理论模式都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型。本译丛作为近年来移译西方公共管理学术专著若干努力中的一项尝试,其选题也力图反映在以上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批最新成果,从而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界理解西方国家公共治理之道,理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译丛所选择的八部学术专著,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四部专著主要是关于公共管理理论在公共选择理论、官僚经济理论、制度分析理论和新组织经济学等的影响下的研究成果。《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是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官僚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姆·尼斯坎南最主要的学术专著。1971年尼斯坎南出版其经典理论著作《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假设和分析方法研究分析官僚体制和官僚行为,并在系统批判官僚制组织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他的这部经典著作,不仅是批判官僚制弊端的扛鼎之作,其所提出的改革主张,更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新保守主义改革最主要的理论指导之一。出版于1994年的《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汇集了《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以及尼斯坎南就官僚经济理论这一主题20年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尼斯坎南官僚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而敦利威的《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则是综合分析民主政治体制和官僚制行政体制运作的一部力作。就职于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的帕特里克·敦利威是目前英国最富盛名的民主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之一。《民主、官僚制和公共选择》一书,

在比较分析了多元主义途径、统合主义途径、集体行动途径和新右派模型有关民主国家政府治理的理论观点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官僚机构塑造”模型,是透视当代民主国家治理之道的一部代表作。新西兰著名学者穆雷·霍恩的《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则运用制度分析和新组织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公共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对管制机构、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等多种管理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在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选择问题,是一部富有创新性和洞察力的剖析公共管理组织模式的代表作。霍恩的研究对于代理机构设计、管制模式创新和公务员制度改革都极具价值。鉴于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日趋发展的重要地位,本译丛还选择了英国著名学者拉本德拉·贾的《公共经济学》一书。

第二类两部专著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分析。新公共管理是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治理之道变革的理论概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新公共管理都正在重塑着公共管理的模式和结构。本译丛选译了瑞士著名经济学家、公共管理学家简·莱恩分析新公共管理内在逻辑的《新公共管理》。莱恩准确地将新公共管理界定为签约外包制(contracting-out)和用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重塑政府管理模式,构建企业家型政府(contracting-in),认为新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在书中系统地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主要机制、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是系统论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英国学者诺曼·弗林的《公共部门管理》,则以最先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英国公共部门市场化改革为分析对象,在论述英国公共部门管理所处的政治与政策环境的基础上,详细地剖析了撒切尔政府、梅杰政府和布莱尔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具体地分析了业务外包、合同外购、强制竞争、私人融资协议、市场检验、战略性承包等市场化管理措施,并对英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成效进行了总体评价,对英国公共部门管理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是理解英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三类两部专著则是关于管理决策理论研究的。自从1947年赫伯特·西蒙倡导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以来,管理决策理论一直是公共管

理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管理决策理论主要有两大研究取向,一是以 H·A·西蒙为代表的一般决策理论,重点研究人类组织决策的一般逻辑;一是由 C·E·林德布洛姆、Y·德热等着力发展起来的政策科学,重点研究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以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改善公共政策质量。英国著名思想家杰奥弗雷·维克斯的《判断的艺术:政策制定研究》,属于第一种研究取向的一部管理决策理论研究经典著作,对西蒙所提出的决策理论进行了深邃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理论见解,是理解人类组织决策行为内在逻辑的一部理论巨献。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切尔·黑尧的《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则属于第二种研究取向。作为研究公共政策过程的一部名作,《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的关键特色和核心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公共政策分析著作所遵从的理性分析传统,以现代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和分析主线,“主要依靠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作为分析的工具”,透过对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理论、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视角的国家理论,以及工团主义、政策网络、政策共同体、官僚经济理论、制度分析理论、宪政分析理论、强国家和弱国家理论,和理性决策模型、渐进主义、官僚理性模型、垃圾桶模型等理论模型的综合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国家错综复杂的政策过程提供了各种可供选择的研究途径的图景。作者精深的理论分析,拨开了笼罩在现代国家政策过程中的种种迷雾,使我们得以清晰地洞察到政策过程的权力和利益博弈的实质。

我国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恢复重建以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仍然处于草创期!因此,要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以开放的姿态,充分地吸收和消化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研究的成果。本译丛就是抱定这一宗旨而启动的。必须指出,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首先是以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为基础形成的,西方国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对有关学者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充分汲取有关研究途径理论营养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在充分认识到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普遍性,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必须

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绝不可以照搬照抄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管理模式。

在选题、联系出版社和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同仁的惠助和支持。著名学者 Robert A. Dahl, Charles E. Lindblom, William A. Niskanen, Jr., Christopher Hood, Arie Halachmi, Jane-Erik Lane 等为选题提供了热情的帮助, Jane-Erik Lane 更友好地馈赠了他的《新公共管理》一书的中文版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浦劬教授、徐湘林教授等一直全力支持译丛的翻译出版工作,王浦劬教授并亲自承担了有关专著的翻译工作,崔冰女士在联系出版社过程中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化教育编辑中心的编辑们为译丛翻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各部译作中难免存在着错误和不足之处,恳切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 者

2003 年夏于燕园

译者序

就特定问题而形成的学术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争论由此而生。在形形色色的学术流派和观点面前,人们应该保持独特的鉴别力、鉴赏力和判断力。这既是形成和发展特定学术观点的一个来源,也是甄别不同学术观点的有说服力、可接受性的一个基础。通常,由于人们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的不同,所设定的逻辑前提的不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的不同,观点的差异和碰撞也是情理中事。不过,当特定的学术流派相对普遍地被接受或者是在特定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时,它的说服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在充分重视结论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忘记了这些结论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也就是价值立场、逻辑前提和分析方法。

就民主而言,特定的民主总是隐含着特定的价值立场和逻辑前提。正是这个原因,才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差异,才有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目标、一种政治制度、一种议事程序或是一种行动规则的不同预设。同样,经由不同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就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政治现象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传统政治学当中,学者们通过采用历史分析、规范分析和制度分析,对政治理想、政治权力和政治现象做出了汗牛充栋的解释。当经济学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渐发展而成为一门显学的时候,它的结论连同基本的分析方法也受到了关注和运用。最初,经济学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着眼点,提出了也能够为政治学研究者所接受的政府职能定位论。“守夜人”政府或者是政府干预论的相关主张,大抵都是如此的。

当公共选择理论日益兴盛时,它的逻辑前提、基本分析方法连

同最终结论都开始全面地“侵入”政治学研究领域。这种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行政改革思潮中看得非常清楚,在现今中国的行政学界和政治学界也仍旧“宝刀未老”。它以对微观个体的经济学假定作为出发点,通过延展理性的逻辑,颇有几分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民主实践中为政治学家们所长期关注的政治现象,甚至有逐步取代经由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的趋势。当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这种趋势时,公共选择理论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事实上也就得到了确立。它在各个时期的理论流派都能就集体行动、团体理论、投票行为和政治竞争做出一套有说服力的阐释。它们与多元主义、统合主义等政治学研究途径的差异和分野也由此得到了体现。只不过,这种分野并没有导致势均力敌的竞争格局,而是以一方压倒另一方作为当前的现实。究其原因,恐怕既在于公共选择理论体系自身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人们并没有更多地去关注公共选择理论的初始假定和分析途径。

就官僚制而言,人们从青睐它的理想模型,到意识到理想模型与官僚制现实之间的反差,再到当代铺天盖地式地批判和反思、摒弃和排除官僚制的趋势,都代表着人们对寻求理想组织形态的期待。在经典的官僚制理论中,基本的出发点在于从中观层面上构建组织的结构形态和运行机制,从而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但当官僚制作为一种工具性模型应用在政府管理领域之中时,人们才发现官僚制的现实运作并没有实现初衷。于是,人们开始寻求个中的缘由。一些人将焦点放在作为官僚制基本组成单位的微观个体之上,他们发现官僚制的运作与官僚的个人动机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官僚制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乃是官僚个人追求机构规模最大化和预算最大化的利己动机的祸。

这种对官僚个人最大化动机的认识,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相契合;或者正是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理论预设的必然结果。这既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和研究官僚制的人中间的影响力,也预示着以微观个体作为逻辑起点的分析方法将深刻地影响对官僚制的研究和探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只要深入地考

察一下以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不过,人们没有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更多的质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夸大或者是应用了个人的利己动机,以至于忽略了官僚个人所处的地位和机构环境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帕特里克·敦利威教授在本书后半部分对不同层次官僚和不同类型官僚机构的划分和分析,将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作者对预算最大化模型和机构塑造模型的比较分析以及他的最终结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理性经济人假定、重新考量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分支流派、客观评价官僚制及其他替代性的可选组织形态,都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当然,我们应该同等地关注作者的独到见解以及他所采用的分析途径和方法。

就公共选择理论而言,当大多数研究者折服于它的解释力时,我们很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理论上的预设终究不等于现实状况,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并不能涵盖人类行为的全貌;利益最大化可能是构成行为动机的主要层面,可能使得公共选择理论更具说服力,但绝不是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尽管如此,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革命性地影响了当代的政治科学和行政思潮,尤其是它本质上为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正是由于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新右派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它对西方国家实际政治的影响才更加巨大。比如,鼓励人们去采用私有化或官僚竞争等策略。在这一点上,敦利威全面地考察了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右派理论的研究文献,并对新右派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客观地总结了唐斯和尼斯坎南等理论家著名的经验性研究,也为研究者和子研究领域提供了指针。

从以上诸个方面来看,本书堪称一部力作。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会多层面地了解到多元主义途径、统合主义途径、集体行动模型和新右派模型对民主和官僚制两大经典话题的系统阐述,研究者也将体会到敦利威教授对每种分析途径的基本假定和分析方法的剖析和质疑,更将领略到作者在不同分析途径之间的纵横阖合和转换自如。我们更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对作者的独具匠心有自己的深刻理解。

不能不提及的是,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和赵成根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也得益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所给予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妥当、不贴切甚至是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庆东

2003年夏于北京大学

前 言

最初对本书中的某些思想进行研究时,我对公共选择理论完全持着批评态度。我的理想在于从个人偏好出发去批判某些重要的理性选择模型,在于表明这些模型内在的不一致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并努力证明这只是一个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研究项目。我本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仅仅是用来达到这一有限目标的阶梯;后来,当它不再需要时,我将其弃之不用。10年后,我围绕着特定类型的制度性公共选择方法重构了我的绝大多数研究。如今,我将工具性模型视为清楚地思考政治生活诸多复杂性的模式;如果不使用这些工具性模型,我就无法展开研究。然而,我仍旧怀疑绝大多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特别是怀疑它在实际政治中与新右派的密切联系。

公共选择理论得以发展成为替代性政治科学的方式带来了双重危险。一方面,该领域的实践家经常攻击那些并不成熟的表述。因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技术性的文献也日益增多。其中,一些重要著作的初始假定在总体上被忽略了。并且,这些经验性应用研究在内在逻辑上非常混乱,它们所固有的问题由于正式模型的发展步伐而没有得到理睬。在此过程中,现有的经验性知识也常常被不得要领地加以抨击,或者干脆被忽略掉了。另一方面,在那些被公共选择理论侵占了的领域内,采用替代性研究途径的政治科学家们经常以辩护的方式做出回应;他们完全抛弃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只是对公共选择理论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做出了非常一般化的或肤浅的批评。这样,政治科学家与公共选择理论家之间像是“两个聋子在对话”,其结果显然难尽人意。因为这种对话既意味着缺乏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严格考察,也意味着重构后的公共选择模型的经验性

应用很少会得到赞许。故此,本书的目的即在于,为在政治科学与公共选择理论之间建立更丰富、更重要的相互联系贡献力量。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我与休吉·沃德(Hugh Ward)在1981年共同发表的论文。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现在被整合到第四章和第五章之中。我非常感谢休吉,并在此郑重致谢:没有他的投入,我根本不会有信心进行这种冒险,也根本不会有信心在几次并不完美的修订之后仍能坚持这种冒险。在这些章节中,鲍伯·古丁(Bob Goodin)与休吉一样,也对我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鲍伯既是我的好友,又是一位编辑;他总是能够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争论,也为我提出了很多进行深入思考的途径。

我在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的几位同事——布莱丹·奥里利(Brenda O'Leary)、布雷安·拜利(Brian Barry)和戴斯蒙德·金(Desmond King),都十分慷慨地同意阅读本书的全部草稿并加以评论;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审阅了第二部分的所有内容。由于他们提供了详尽而大有裨益的回馈,我对书稿进行了重大的修订,致使本书的出版推迟了6个多月。但这些修订显然说明,我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

同样,我也要感谢那些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他们出席了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公共政策研讨会。他们经受了我在早期的诸多变化,并耐心地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回答、兴趣以及在研讨会上的提问,不仅在实际上激发出本书中所有更加完善的观点,也拓宽了我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此外,我也感谢所有那些非常专业的同事们。他们在政治研究会(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PSA)的研讨会上对这些思想的早期版本提出了批评;他们都是杂志编辑和审稿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罗德·罗茨(Rod Rhodes)、乔治·琼斯(George Jones)、安东尼·金(Anthony King)、伊沃尔·克莱威(Ivor Crewe)和维恩·格兰特(Wyn Grant)。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帮助我确定了本书的最初宗旨,哈维斯特-魏特西夫出版社(Harvester Wheatsheaf)的克莱尔·格雷斯特(Clare Grist)为我

提供了外部动力。这种动力是我在本书最初签约以后很长时间内顺利完稿所必需的。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和另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评论家,促使我在准备将本书付梓出版的后期又做出了一些修改。我对此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感谢希拉·敦利威(Sheila Dunleavy),她给了我不计其数的帮助和鼓励。结构主义者曾有句格言:“作家并不著书立说。”在取笑这一格言成为时尚的年代里,我至少明确地意识到,本书中任何有价值的内容都是共同努力的结果。

帕特里克·敦利威
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

致 谢

我要感谢两份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允许我从最初发表于这两份期刊的论文中摘取某些段落重新使用。

1. 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英国政治科学期刊》:

(a)《官僚、预算与政府增长:一个工具性模型的重构》,载于《英国政治科学期刊》(1985),第15卷,第3期,第299—328页。

(b)《团体认同与个人影响力:重构利益集团理论》,载于《英国政治科学期刊》(1988),第18卷,第1期,第21—49页。

2. 巴塞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发行的《公共行政》:

(a)《对私有化兴盛的阐释:公共选择途径与激进途径》,载于《公共行政》(1986),第64卷,第2期,第13—34页。

(b)《英国中央政府建设(第一部分):分析框架》,载于《公共行政》(1989),第67卷,第3期,第249—275页。

(c)《英国中央政府建设(第二部分):经验性发现》,载于《公共行政》(1989),第67卷,第4期,第391—417页。

我和休吉·沃德曾合著过一篇论文——《外生性投票者偏好与执政党:政党竞争经济模型的若干内在问题》(载于《英国政治科学期刊》(1981),第11卷,第3期,第351—380页)。我在此感谢他慷慨地允许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摘取其中的一些材料,同时也感谢《英国政治科学期刊》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复制其中的某些段落。

此外,我和本书的出版商都感谢约翰·维利和约翰·萨恩斯(John Wiley & Sons)。他们允许我从戴维·罗伯特森(David Robertson)的《政党竞争理论》(伦敦:维利-萨恩斯出版社,1976年)中复制第98页的图19。